

第一章 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

——近代史上的学生运动

第一节 公车上书

甲午战败，朝野震惊

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惨败，战火延烧到中国东北边境，而清廷却歌舞升平，为慈禧祝寿。战争的结果，签订了丧权辱国的《马关条约》。《马关条约》签订的消息由《上海新报》透露，天下震动，“举国争愤”，在全国掀起了一股反投降反侵略的怒潮。各界人士纷纷上书，要求政府“拒和、废约、迁都再战。”

中日换约的期限迫近了，聚集在京城应考的许多知识分子，激愤之情不可抑压。文人士大夫不能不对几十年来国家的安危进行反思。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变法维新运动便在甲午战后迅速地兴起。他们的领袖就是康有为。

1891—1894年，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康有为，在广东广西讲学，聚集爱国青年，培养了不少维新运动的骨干。万木草堂的康门子弟（如麦孟华、梁朝杰等）不少人列名“公车”。康有为讲学的内容，主要是中国数千年来的学术源流，历史政治沿革的得失，联系其他各国加以比较推断，寻求救中国的方法。他在讲学时，每当讲到外国侵略，民生凋弊时，常常慷慨歔救，甚至流泪。这样就使得受教育的人深受感染，不敢自暴自弃，毅然肩负起国家兴亡的重任。康有为改良思想的形成，是和他的学生们共同努力取得的。比如他在著《孔子改制考》时，先由他指定一二十个学生，把上自秦

汉下至两宋各家的著述，从头检阅，凡有关孔子改制的言论，简单录出，注明见于某书的第几卷第几篇。他的著作也有不少是和学生共同完成的。弟子陈千秋“赞助编检”《新学伪经考》的成书；韩文举、林奎参加“校讎伪夺”。《孔子改制考》由欧榘甲、王觉担任总校。参加初校的还有康同勳、广南嵩等。《桂学问答》则是由弟子况仕任、龙应中听讲时笔录的。梁启超在《南海先生七十寿言》中说：“先生著《新学伪经考》方成，吾侪分任校讎；其著《孔子改制考》及《春秋董氏学》则发凡起例，诏吾侪分纂焉。”学生们爬流史料，看到原来古代学者也曾对古文经发生过怀疑，那么他们能否走得更远一些呢？就把它系统了起来。这些撰著原本是为着打击古文经学的，参加这些工作使学生们改变了向来六经如“日月经天，江河流地”无懈可击的传统看法。康有为的学生“从游甚众”，既听讲学又参与建立变法理论的编纂，自然接受了康的维新变法思想，因而“靡然向风”也“非圣无法”起来。当他们把从老师那里学来的一套讲给亲戚朋友听时，“流俗骇异”都把他们叫作“康党”，他们也心安理得深信不疑。数以千万计的青年知识分子受到了启蒙教育，思想得到一次很大的解放——西方的资产阶级社会学说介绍到中国来，和封建主义思想展开了激烈的搏斗。

1874年1月5日创刊的大型日报《循环日报》是第1张改良主义的报刊，在政治改良思想的传播上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。王韬、郑观应在该报上发表过不少文章。这些文章后来辑入《救时揭要》、《易言》、《盛世危言》等文集，引起了青年知识分子的注意，起着动员中国人民为挽救民族危亡而斗争的作用。

在“公车上书”这一年，1895年留学英国归来的严复开始办报，发表了一系列著名文章，强烈呼吁对日抗战。严复还提出了图自强的方案，抨击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。这些文章各报纷纷转载，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。这些向西方学习的先进人士，给广大青年

生带来了精神食粮，拓宽了他们的视野。举子们敢于在康有为起草的上书中署名，是有思想基础的。

康有为联合 18 省举人上书

1895 年 4 月 17 日（古历三月廿三）清政府与日本签订《马关条约》。消息传来，在京应试的各省举人纷纷联络，要给皇帝上书抗争。起初是广东举人梁启超联名百余人；湖南举人任锡纯、文俊铎、谭绍裘等各联名数十人，到都检院请求替他们代奏。接着直隶、山东、山西、河南、云南等省反对签约的上书也相继而来。

三月二十八、三十，四月初二、初四、初六这几天（都察院双日堂期），都察院门前车水马龙，举人们议论纷纷，争先恐后地上书。但这些上书都没有报上去。于是举人们联合起来共同上书。康有为的名声很大，就公推他起草公呈。草稿写好后，举人们聚集在宣武城南松筠庵绿草堂传阅、讨论。初十那天向都察院递送。在上面签名的有 1300 人。

这次上书，都察院推说《马关条约》已经签订，无法挽回，拒不接受。虽然“公车上书”未能阻止《马关条约》的签订，但事件本身是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爱国知识分子的大请愿。在民族危亡，外交和迫的紧急情况下，爱国青年大胆地提出挽救沦亡的变法维新之计。以康有为为首的举人们，是一些立志改革的人。他们无所畏惧，这次上书表现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。在当时社会条件下，应该说是具有进步意义的。这次上书，揭开了中国改良运动的帷幕。“公车上书”广为抄造，造成了变法维新的舆论。从此，办报刊、设学会、广结同志，寻求皇帝的支持，终于演出了百日维新悲壮凄凉的一幕。这是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思想影响的产物，是中国近代青年运动的一种特殊形式，在中国历史上还属第一次。

第二节 拒俄运动

誓以身殉，“为炮火引线”

1900年八国联军出兵镇压义和团起义签订了《辛丑条约》。帝国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涛，沙俄的魔爪首先伸进中国东北。1900年7月，沙皇政府以保护中东铁路为借口，调集17万侵略军入侵我国东三省。沙俄侵略军所到之处，烧杀抢掠，无恶不作，制造了惨绝人寰的血洗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大惨案。“海兰泡商人一日尽沉诸江”被枪杀、淹死的居民象冰排似的顺江而下，鲜血染红了波涛汹涌的黑龙江。侵略军杀向江东六十四屯，把居民集中在几个大屋里，活活烧死。前前后后在海兰泡、尼布楚、司特律津、伯力、海参威等地屠杀中国居民20多万。10月下旬，沙俄侵略者软禁了清朝盛京将军增祺，迫签《奉天交地暂且章程》。虽声称要归还奉天省，实际上却力图把它变成沙俄殖民地。1902年2月，在和清政府驻俄公使杨儒谈判中，又提出书面约款12条，企图全面剥夺中国对东北的主权，还要求将蒙古、新疆、华北等地划为俄国势力范围。

《暂且章程》签订的消息传出后立即引起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。3月上海绅商借张园集议到会200余人。会上有人演讲说到中俄条约关系到中国的存亡时，听众都拍手赞同。集议后，送公禀给江鄂两都督。

东北人民开展了如火如荼的斗争，沉重地打击了侵略者。俄国国内也爆发了大规模的工人罢工和农民暴动，使沙俄政府面临着巨大的困难。同时，美、日、英等帝国主义也不甘心沙俄独吞东北，迫使沙俄政府改变策略，于1902年签订了《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》。条约规定在“再无变乱发生亦无他国之牵制时”俄军分

期于 18 个月内撤离中国东北。

但沙俄并不执行上述条约。1903年2月，尼古拉二世批准俄军无定期留驻中国东北。4月18日沙俄政府向清政府提出七项要求，力图确保东北为其独占的势力范围。

在上海的江苏等18省爱国人士再次集会于张园。爱国、育才等学社学生穿戎服而来，各本、爱国女学学生亦都入座，到会千余人。其中爱国学生人数最多。舆论认为青年学生踊跃参加，足以代表新中国的前途。开会时大家齐诵《爱国歌》，高呼“中国万岁”。会议致电清政府，表示俄国的七项要求即使政府承认，“全国国民万难承认”。正在开会，忽接东京留学生来电，得知留日学生组织了义勇军，打算赴东北抗敌。有个叫龙积之的说：我们上海同志难道不是中国国民吗？我们岂可放弃责任？他率领到会的人到大草场，排成军队行列，向东一鞠躬，表示对留日学生的钦佩和同情。不久，上海成立了四民总会（后改名国民总会），签名入会的有五六百人。该会也设立了义勇队，以御外侮为宗旨。1902年成立的中国教育会也组织了义勇队，有百余学生加入，“旨在主战”。

留日学生听到俄国进兵东三省的消息，各省同乡会纷纷开会研究对策。留学生钮永建等发起组织拒俄义勇队，希望以学生会馆名义召集全体学生组织学生军以拒俄国入侵。会馆干事章宗祥、曹汝霖恐引起政府疑忌，拒不同意。青年会（这是日本留学界中最早成立的革命团体）中的人得知这个消息，就与钮永建等联名发起人召开会议。1903年4月29日，他们在东京神田区锦辉馆召开大会，到会约五六百人。有人发表演说：政府主战与否，未能逆料，“但能与俄人战，虽为苍头走卒不辞……吾辈以大义所激，誓以身殉，为炮火引|线，唤起国民铁血之气节。中国死吾辈数人，如九牛一毛，我国民有知，亦当为之感泣”。说到这里，突然厉

声高呼，“死生一发之际，还想四面周到，难道还要预备衣衾棺槨吗？”听众都很愤激，涕泣不能抑制，当场决议成立拒俄义勇队。签名参加的有 130 余人。5 月 2 日拒俄义勇队改名为学生军。学生军分甲乙丙三区队，每区队又分四个分队。公举蓝天蔚为队长。蓝天蔚发表了演说，他说：“中国贱武右文，近今数百年更甚……今者同志诸君子仗大义，发公愤，憐于亡国之祸，欲以至贵至重之躯捐之沙场以拒俄，以争国权，诚中国有史以来未有之光彩，亦诚中国有史以来未有之惨剧也。”学生军每日操练，并且派出特派员，到国内向政府、各省以及南洋各地活动。留日女学生有的加入赤十字会，有的设立共爱会。

这时，全国最高学府京师大学堂也点燃了拒俄烈火。4 月 30 日，师范馆、仕学馆学生“鸣钟上堂”发起举行全校大会，声讨沙俄侵略。师生 200 多人参加。首先由助教范静生演说，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。学生也登台发表意见和建议。说到悲痛处，失声痛哭流涕。在场同学“齐声应许，震撼天地。”会后起草了《京师大学堂师范、仕学两馆学生上管学大臣请代奏拒俄书》。在上面签名的有 73 人。同时发出《京师大学堂学生公致鄂垣各学堂书》向湖北学生介绍京师大学堂拒俄集会情况，号召同学们“发大志愿，结大团体，为四万万人民请命，并且提出‘与其坐而亡，不如争而亡’，使海外各国看到中国尚有士气。这封信在湖北学生中（后来又传到安徽等省）引起很大反响。湖北学生 500 余人在演说堂讨论拒俄问题，并发电报给各省督抚，及上海等地各学堂和外洋学生。安徽省志士于藏书楼举行演说会，组织了爱国会。到会的有安徽大学堂、武备学堂、桐怀公学等各学堂约 200 余人，加上来宾约 300 余人。书楼窄小，很多人站在门外，群情踊跃，气象万千。陈仲甫（独秀）讲述了会议目的。他说当今“非得提倡军人精神，方能立国。”外患日亟，瓜分立至，吾辈恐有不足为牛马奴隶之一日。”词情慷慨，满

堂敬^歎。会后各学堂学生“勃发忠义”，有的拟公呈清院抚电奏，有的拟公电上达政府。江西学生愿意组织一部分同学附入上海学生军，同为响应。从日本归来的邹容还发起组织中国学生同盟会，目的在于使学界结成一个大团体。其他各地学生也很义愤，有的出小报、有的画漫画进行宣传。

这一时期的拒俄运动，主要是为了保卫领土，挽救被瓜分之祸，采取的也是合法形式，函电由督抚代呈，待当事者采择，朝廷之定断。”拒俄运动所恃的力量主要是“中等社会”青年学生。伴随着废科举、办学堂、派留学生，在中国出现了一个不同于旧式文人或封建士大夫的新式知识分子群。这个知识分子群的人数逐年增长。与清朝统治者的愿望相反，他们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，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，逐渐觉醒，纷纷走向清政府的对立面。

御外侮 必先革命

留日学生派出特派员到北京，运动清政府，要求资助饷械，北上抗敌，却遭到清政府的弹压。清帝下密谕给各督抚：“前年唐才常托勤王以谋革命，现在托拒俄以谋革命，用意相似。朕以为该学生等既叛朝廷，朝廷亦不得妄为姑息……访闻有革命本心者，即可随时获到，就地正法。”有识之士逐渐觉悟到期待虐民卖国的清政府去抗敌，是愚不可及的。中国知识界的先进分子终于觉醒：除了用革命的手段推翻卖国的旧政府，建设救国的新政府之外，没有别的路可走。他们逐渐集合到孙中山的旗帜之下，使革命思潮澎湃一时。“救亡革命”成为学生思想的主流。拒俄运动一变而为反清革命。

清政府在日本的走卒蔡钧（驻日大使）竟然勾结日本政府勒令

解散学生军，制止学生练习兵操。学生们感到报国无门，莫不义愤填膺，痛哭流涕。青年会同志联络学生军中坚定分子，秘密组成军国民教育会。它的宗旨是：“养成尚武精神，实行爱国主义。”鼓吹这个宗旨为的是唤醒国人的迷梦。这时，上海《同文沪报》误传留日学生派出的特派员被清吏杀害。会员们听了这个消息，愈加激昂，决定采取激烈革命行动：一、鼓吹 二、起义 三、暗杀，并选派同志返国分省运动起义。这些同志被称为“运动员”。黄兴、杨卓林回湖南活动。陶成章回浙江发动会党。龚宝铨到上海设立活动机关。程毓鏞、程家桢、苏子谷等回国讲学。有的到南洋，各负相当任务。

1903年9月，沙皇政府重新向清政府提出要挟。10月，沙俄马步兵、炮兵1000余人闯入奉天，占领清行宫及将军衙门各署，在那里升起了沙俄旗帜。

当这一警讯传到南京时，水陆师、高等师范、练兵学堂等校学生数百人大会于北极阁，掀起新的拒俄运动。哈尔滨拒俄会、抗俄铁血会、东省仇俄会……各种组织纷纷建立，开展活动。

1904年2月8日，日本为了打破沙俄的独占，在英美的支持下，突然袭击了旅顺口的俄国舰队，日俄战争爆发。沙俄政府要求清政府的东北地方官吏遵守“俄国训令”交纳捐税，中国军队受俄国调度，奉天的中国人全部迁往城外，让俄国人驻扎。为了保卫东北，我国知识界的拒俄运动进入新阶段。

京师大学堂部分同学退学，投笔从戎，到东北进行武装拒俄斗争。1904年，师范馆学生丁开嶂约集同学朱锡麟、张榕等奔赴关外。丁开嶂集合当地英雄热血壮士，除海内外将士外，还有直、奉、吉、黑四省民间武装领袖数十人，其部下小夥数百，大夥数万。这支队伍发布檄文，指责俄国“任意奴隶我官府，牛马我人民，剥蚀我资财，淫掠我妇女，倘再不振吾精神，湔除丑类，结吾团体，扫荡

腥闻，将来必灭尽我自家、殄灭我种族……”。这支队伍“自治之法颇严”成员个个“痛心疾首透爪裂目”士气高涨。据《东方杂志》1905年第1期《杂俎》记载：“满洲义军自发布檄文后与俄军交锋二十余次。”朱锡麟联络爱国武装组织了东亚义勇军，配有新式枪械，纵横驰骋于新民屯附近，在各地遇见俄人就袭击，时常切断俄兵的交通要道，“或窘俄之哨兵或毁俄之铁路专以妨碍俄军为目的。”满洲居民和他们很亲密尊他们为“爱国义士”。

“军国民教育会”成立后，革命党人更前进了一步，由鼓吹到实行。军国民教育会设支部于上海，由蔡元培、章行严、刘申叔等主持，以爱国女校为机关，创苏了《俄事警闻》（日报）后改名为《警钟》。改公开的拒俄同志会为秘密结社，名为“光复会”。湖南黄兴等以军国民教育会的名义回湖南活动，另成“华兴会”，打算在长沙起义。1904年前后，上海福建学生会、江西自强会、安庆武毅会…都以革命暴力推翻清政府为目的。学生们觉悟到：要御外侮，必先革命。

第三节 为辛亥革命奔走呼号 流血牺牲

民主革命思潮澎湃

20世纪初，清政府被迫推行“新政”。各省陆续废科举，设学堂，派遣留学生。维新变法的唯一成果——京师大学堂也保留了下来。中央还成立学部以管理全国学校。但清政府仍设法箝制学生思想。1903年颁布的《学堂章程》中规定：“中小学宜注重读经，以存圣教。”后来更把谈经作为大小学堂的必修科目。

初停科举，反对的人很多，上 New 式学校的人很少。清政府乃

《学堂章程》见《大清新法令》第11册。

规定 高小毕业生成绩甲等的奖给增生 乙等的奖给 附生 丙等的奖给 修生 同学们戏称之为“半边秀才”。依次往上推 京师大学堂毕业生 可以得着“翰林院编修”或“庶吉士”的头衔。当上秀才的学生还要头戴顶子身穿蓝绸镶金边的衫子 跟在知县官、县教谕和本校校长的后面，在文庙内绕泮池一周，真正做到了“游泮”。科举虽停止 而秀才举人可以直接从学校里出来。这样 刺激了一些富有家庭 父母们踊跃地送子弟上新式学堂 甚至自费送出国留学。

外出留学的学生，以日本最多。青年们并不受清政府的羁绊，留学生一到日本，急于寻求新知识。他们接触到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，濡染自由平等博爱学说，“鼓吹排满革命者日众。”

1902年，正值明朝灭亡242周年。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秦力山、章炳麟等积极筹备以纪念明朝灭亡来申尽清朝罪行的活动，以唤起同学们进行反清革命。有几百人参加了这一活动。他们还写了纪念会的宣言书，分发海内外华侨，声势很大。1903年春节 留日学生又借春节团拜的机会，宣传革命。许多学生登台演讲 愤怒地揭露清政府的崇洋媚外，呼吁同学们积极投入推翻清政府的斗争。同学们义愤填膺，表示和清廷不共戴天，要决一死战。1906年8月20日，东京华侨和中国学生集会欢迎孙中山自欧洲抵日本，气氛也十分热烈。

留日学生除了集会之外，还翻译西方书籍、创办刊物，进行革命鼓动。刘成禹、盗天蔚等主编的《湖北学生界》 主旨在“以世界知识及民族主义唤起内地学生觉悟”。《浙江潮》、《新湖南》、《江苏》等也相继并起。出版物风起云涌盛极一时。到了1905年，湖南、湖北、广东、江苏、安徽等几个省的留日学生“为了破除地方团体意见”在东京联合创办了革命刊物《二十世纪之支那》，宗旨是“以正确可行之论 输入国民脑 使其有独立自强之性 而一去其旧

染之污，为世界最文明之国民，进而为世界第一强国”。创刊号上有轩辕像，附有“嗟吁四万万同胞兮，尚无权典而忘祖”的题辞，使用黄帝纪元。孙中山亲自到这个杂志社和宋教仁、陈天华等人长谈，争取他们的支持。1905年8月20日，同盟会在东京赤坂区召开成立大会。黄兴提出《二十世纪之支那》社的半数以上社员已加入同盟会，建议把这个刊物改组成同盟会的机关刊物。在这个刊物的基础上，创办了《民报》。留日学生陈天华是《民报》创刊时最积极的撰稿者之一。《民报》的印刷、发行工作，大多是留学生们亲自负责的。

1905年冬，清政府驻日公使杨植，为了破坏留日学生的爱国运动，勾结日本文部省颁布所谓《清国留日学生取缔细则》。内容不但禁止留学生的爱国运动，而且侵犯人身自由。日本报纸也对中国留学生进行诋毁。留日学生向日本政府交涉无效，8000余人全体罢课。湖南人陈天华愤而投海，留下绝命书，勉励同学坚持爱国主张。同学们更加愤慨，齐集浙江同乡会开会，一部分人主张“忍辱力学”，一部分人主张回国实行革命。秋瑾发言，力主回国。她辞意激昂，随手从靴筒中取出倭刀，插在讲台上，说：“如果有人回到祖国，投降满虏，卖国求荣，欺压汉人，吃我一刀！”

回国留学生和国内革命学生、革命党人汇合在一起，携手革命。1903年从日本回来的邹容，写了《革命军》在《苏报》上刊载。他指出清政府是个卖国政府，“割我同胞之土地，抢我同胞之财产，以买其一家一族五百万家奴一日之安逸”，号召人民“作十年血战之期，磨吾剑，建吾旗，各出其九死一生之魄力”，同清政府“驰骋于枪林弹雨之中。”是他首先提出“中华共和国万岁”的口号。短短几年内，《革命军》发行百万册以上。大江南北，人们竞相传阅。《苏报》案发，章炳麟、太炎被捕，邹容自己去投案，死在狱中，年仅21岁。陈天华的《警世钟》、《猛回头》等以鼓词的形式，浅显通俗

的语言，叩响人们的心弦。他呼吁：“读书的放了笔 耕田的放了犁 耙 做生意的放了职事 做手艺的放了器具 齐把刀子磨快 火药上足 同饮一杯血酒 呼的呼 喊的喊 万众直前 杀那洋鬼子。”他指出 朝廷已是洋人的朝廷 把“救亡”和“革命”联系起来。这些小册子很快地流传全国各地，特别是两湖各学堂和新军军营，对促进各地武装起义，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。

1906年7月15日，东京革命留学生在神田锦町锦辉馆召开大会，欢迎章太炎出狱来日本参加《民报》编辑工作。12月《民报》社举行“本报纪元节庆祝大会”。这两次大会参加的人很多 后一次到会6000人 会开了6个小时。孙中山、章太炎、日本友人等12人发言，“感慨淋漓”“激昂飞越”。孙中山论述了民族革命和政治革命社会革命的关系，批判了狭隘的种族主义，使到会的学生受到很大的教育。

那时，留日学生约13000人。他们当中“十之七八皆持革命主义”。《民报》与《新民丛报》的论战 留日学生几乎都卷入 绝大多数都赞成革命。他们批驳保皇派，集合在孙中山的旗帜之下。云南留日学生一百三四十人，加入同盟会的就有80人。

从日本回来的学生 翻印《猛回头》、《狮子吼》、《做新民》、《黑龙江》等书籍，秘密在军学两界散发。有些地区还创办阅览室，备有革命书刊供群众阅览。坪江阅览室的墙上写着诗：“大地沉沦几百秋 烽烟滚滚血横流 伤心细数当年事 同种何人雪此仇！”有些学校用《扬州十日屠》编成算术。如清军在扬州屠杀一次若干人，一天三次共杀若干人，一年杀多少人？……用来启发学生觉悟。湖北留日学生还发起组织昌明公司，其任务是招待湖北出洋学生与运售文化书籍，“兼密输革命刊物”。他们还筹款2000元 购买幻灯机片，运回武汉放映，由专人担任说明。凡片中涉及世界民族解放运动与被压迫之苦，必尽量发挥，“说者大哭 闻者落泪。”上海

张园、武昌抱冰堂……也都常常有青年学生开会演讲，“主旨不外反满革命。上海爱国学社”倡言“革命胜过求学”。《革命军》成为学员传阅、谈论以致信仰的中心。两湖总^师范大多数学生，同情同盟会的主张，革命书刊由专人保管，存在调养室（校内的病房，校监不在的地方），全校有 $\frac{2}{3}$ 的同学阅读革命书刊。经过各种革命宣传鼓动，“革命排满”已深入人心。民主革命思潮在全国汹涌澎湃，不可压抑。

投入实际的革命工作

留日学生目睹国内政治腐败，民族危机严重，再也不能安坐书房了，许多人纷纷回国，从事实际的革命活动。有人主张暗杀，有人主张积蓄力量，谋划起义，也有悲愤自杀的。除了留日学生陈天华外，湖南人姚宏业因创办中国公学遭到挫折，在上海投海。曾经致力于制作炸弹、参加过多次谋刺清朝大臣的留日学生杨笃生，受黄花岗起义失败的刺激，在英国利物浦沉海。爱国学生想以自杀来激励国人奋起是不值得效法的。但在当时，确实曾激励了千千万万人民的爱国革命热忱。当陈天华、姚宏业的灵柩运到湖南时，长沙全城学生不顾当局的反对，“万余人整队送葬至山陵”。这次活动成为巨大的政治示威游行。

暗杀活动随着西方无政府主义思潮，也于 20 世纪初传入中国。同盟会成立后，沿袭军国民教育会的做法，建立了专门的暗杀团体，聘请流亡在日本的俄国“虚无党”人为教授。黄兴、秋瑾、黄树中、汪精卫等都曾加入学习。1907 年 4 月，《天讨》全文刊载吴稚写的《暗杀时代》。同年东京《天义报》、巴黎《新世纪》（两者均为无政府主义的刊物）同时鼓吹“以暗杀为首务”。暗杀活动频繁起来。

不少学生埋头学习化学，试验制作炸弹，以备暗杀和起义之用。试验中不慎炸伤的，为数不少。如喻培伦、刘思复等，女学生尹志说姐妹，也参加了秘密制造炸弹的工作。

军国民教育会保定分会，又名北方暗杀团。他们得知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要从北京正阳门车站出发，1905年9月底，安徽公学学生吴樾和赵伯先，争着要去投炸弹。吴樾问：“舍生一拼和艰难缔造，哪一个容易？”伯先说：“自然是前者易，后者难。”吴樾说：“这样，我做容易的，留难的等你去做。”他俩临别置酒，相与慷慨悲歌。吴樾上车后，因为火车动力过猛，炸弹自行爆炸，吴樾牺牲。

后来，广州也组织了支那暗杀团。由青年志士林冠戎担任执行员，准备行刺屠杀革命党人的刽子手李准。饯行时他说：我以身许国，早就视死如归。这次没有什么系念，只是老母亲来不及见一面，引为憾事。因而改名为林冠慈。当李准乘轿经过双门底时，林连掷两颗炸弹，李准被炸倒，折断两根肋骨未死，林冠慈当场牺牲。

暗杀活动往往是革命遭到挫折后的一种急躁情绪的表现。他们热心革命，轻视群众的力量。但是，暗杀表现了革命党人对反动势力不共戴天的英烈气概，引起了清朝统治者的极大震恐。

当时更多的革命学生则投入新军、会党，做艰苦的积蓄革命力量的工作。1904年在华兴会的推动下，6月间武昌学生与士兵数十人组织了科学补习所，推武备学堂学生吕大森为队长。表面上以科学补习为名，实则从事“革命排满”。科学补习所的同志聚集在武昌讨论革命进行的方略。几经研究，都主张从运动军队入手，不轻易发难。于是朱子龙、张难先等投工程营当兵，刘度成去武高等学堂，欧阳端祺去文普通学堂，刘敬庵人马队营……其他各军营学校也各有负责人推动。科学补习所设有专门运动学生、新军的干

事而以新军为重点。青年学生输送入伍，会党群众也输送入伍，密约“务学成健儿待时机至，即起革命，光复汉族”。学生“为革命加入行伍，革命决心大，安于贫困，埋头苦干。在东京参加义勇队的梁耀汉说：“时到今日，不但求与共事者难，即可与言者亦不易得。计惟投笔从戎，自实地做去，天下事或有可为。”这一议论一经提倡，投笔从戎的就陆续不绝。秀士人营当兵或当下级军官，数年如一日，苦心孤诣，奔走呼号，为武装起义尽了宣传和组织的责任。这种精神是很可贵的。湖北革命志士多投入新军，湖南则多投入会党，传播革命火种。投入新军、投入会党，成为革命知识青年和群众相结合的重要形式。

革命志士以“突起革命”首先必须“灌输知识”，使革命思想深入人心。1906年，武昌秘密成立了革命团体“日知会”。“日知会”的特点是以全力进行革命思想的鼓动宣传。会员熊十力组织“黄冈学界讲学所”，梁瀛洲组织群治学社和明新公学，彭养光组织安郡公益社……团结湖北各属青年，与“日知会”遥相呼应。“日知会”每星期开演讲会一次，听者达千余人。

他们还利用星期假日邀约官兵去白云山附近地方集会演讲鸦片战争、中法战争、黄海之战、火烧圆明园等内容……目的在于揭露清廷的腐败，丧权辱国。这种演讲常常使新军们抱头痛哭。“日知会”还在黄州设秘密印刷所，将革命书册分散各校。学生几乎人手一册，军营则由入会会员传递。

“日知会”在高压下化整为零，组织了20多个小团体。1907年以后，又汇成“文学社”、“共进会”。“文学社”纯是军人组织，后来也发展学生；“共进会”则由海内外学生参加主持。湖北新军各营队士兵中都有文学社党人渗入。于是“莘莘学子”（青年学生）与“桓桓武士”（新军）之间沟通了情谊。有些革命党人甚至深入到手工业工人的生产工地，一边干活，一边传播革命思想，使许多

人“醉心于革命”。加入文学社需得社员三人介绍，经社方派人考察，确认与本社宗旨相合愿守本社规章者方得为本社社员”。他们还把革命组织和新军编制结合起来：20人为一排，五排为一队，一旦起义爆发，不用打乱原先的新军编制，即可行动作战。

原先张之洞做两湖都督时，曾推行新政，兴学堂、练新兵，使两湖的风气大开。有志青年都聚集到湖北，有的以此作为进身之阶，有的以此为革命之所。两湖总师范汇集了不少优秀人才，张之洞所设的特别学堂，考选新军中优异士兵与正副目充当学兵，三年毕业回原营选充下级干部。在新军各标营潜伏的革命党人，很多是从这里去的。这也为以后的武昌起义打下了基础。

青年学生在壮烈的黄花岗之役

辛亥革命前夕，革命党人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，打击了清廷的反动统治，振奋了人心。由于多次起义失败，革命党人中弥漫着悲观的气氛。孙中山在檳榔屿召开会议，决定以新军为骨干，联络会党和防营在广州起义。这时，清廷防范加严，广州新军有枪无弹。会议又决定选择青年革命志士500人（后来增至800人），组成敢死队（当时称为“选锋”），先在城内发难，然后打开城门迎接新军。这些敢死队是由留日学生和国内学生和青年组成的。他们设想占领广州后分两路北上，会师武汉。会后由赵声在香港联络新军，黄兴赴南洋筹款。1911年1月，黄兴抵香港，建立了领导机关——统筹部。日本千叶医学校学生方声洞等，负责运送起义时所用的炸弹和武器。由于在南洋筹款时已走漏了风声，清政府电令粤吏严防。加上广州谢恩里的革命机关被破坏，军警如临大敌，风声更加紧急。但革命党男女同志仍争先赴命，抢运枪械子弹。多处机关伪装成婚庆大典，新娘花轿、嫁奁里大都装着枪弹。伙伙采办

的菜中也夹带武器。有的把子弹伪饰于头发包中或颜料罐、饼食盒社_里里，到处分送。这些枪械不少是由留日学生林文、林觉民等冒着生命危险运回来的。

29日下午5时30分，起义的时刻到了。在这次起义中，青年学生起了先锋作用。黄兴等乘肩舆，从小东营出发，其余人打扮成随从，臂缠白布为记。回国留日学生林文等四人吹螺号为令。青年志士们身藏炸弹，右手持枪，腰插短剑，直扑督署。螺号声中数十名勇士鼓噪直扑卫队，大叫：“我辈为中国人吐气，你们也是中国人，若赞成，请举手。”卫队不应，于是枪弹大发。黄兴和林文率先冲入督署，击毙卫队管带，冲入二门。革命党6人牺牲。不久卫队弃枪投降。黄兴等冲入内进，分头搜索。与此同时，留日学生喻培伦等也从督署后门炸墙而入。黄兴在署衙放起火来，火势熊熊，革命党人奋击而出，喊声大震，枪弹如雨，冲锋陷阵。在东辕门，选锋队遇到了敌人。林文奋身上前招呼：“同胞！我们应当同心协力恢复汉疆，不用打！不用打！”他话音未落，就被敌人的枪弹打中而倒下。留日学生林尹民和南洋水师学堂学生冯起骧等也相继战死。黄兴被打断两指，仍继续射击。留日学生陈可钧挥弹冲入敌人中坚，使敌阵大乱。他身受多处创伤，鲜血染红衣裳，还死战拒敌，最后力竭被捕。袭击广州水师行台的方声洞也阵亡。专门炮兵学校毕业的陈更新和林觉民、陈与燊等留日学生，都在攻督署时受伤，血溅遍体。日本警监学校学生石德宽以七尺之躯抗清廷烜赫兵力，“体无完肤，犹呼杀贼”。革命队伍伤亡、被捕或被冲散，陈更新还孤军独战，官军不敢近前，相持三昼夜。他不眠无食，眼红如血，官军层层包围，终因弹尽力瘁被捕。

不少参战的学生在起义前留下绝笔书。他们深信自己的牺牲将会唤醒同胞：“国事成不成，自有同志在。”方声洞到广州前，在日本写好十几封家信，嘱咐妻子在他走后陆续填上日期寄发回家，以